

些器件的对华为出口又是被允许的，像英特尔的芯片以及三星的显示器等等都是可以出口的。由此可见，美国似乎要阻止华为发展 5G 手机和基站。

现在与东西冷战时期相比，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与东亚以及其他地区的产业合作势头很强。日本、中国大陆、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之间的区域内贸易总额里，集成电路贸易占了 24%。如果集成电路贸易被隔断，就会丧失 1/4 的贸易量，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有消息称，中国会尽可能促进集成电路国产化，但中国政府否定了这种说法。我认为，中国不考虑所有集成电路产品的自给自足，但是遭遇出口限制以后会考虑增强国内生产能力。现在中国的超级计算机“申威”和北斗卫星系统的芯片已不依赖美国，都是中国自主开发的。军民两用技术上的中美“脱钩”不应该影响民用技术领域的国际分工发展，在军事技术上“脱钩”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民用品尤其是会影响国际分工的产业领域，必须要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

疫情加速世界经济变局

江瑞平*

我们都在讲“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自然也应包括世界经济。进入 2020 年，已经处在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又遭遇了百年不遇大疫灾的强烈冲击。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这一冲击是阻止还是进一步加速了大变局，是改变还是强化了大变局已经显现出来的一些主要趋向。我的答案是，疫情不是阻止而是加速了世界经济大变局，疫情没有改变而是强化了世界经济大变局已经显现出来的主要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疫情加速了大国实力对比变化。21 世纪前 19 年，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大国之间，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虽也有所调整，但变化幅度不是很明显。这 19 年间，中美日三国实力对比的基本变化态势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 12.7 个百分点，而美国下降了 5.5 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 8.4 个百

* 江瑞平，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点，结果是中国与美国的 GDP 之比在 2000 年是 11.8%，而 2019 年已经提升到了 66%，也就是从 1/10 稍多提升到了 2/3，同时中国从仅相当于日本经济总量的 1/4 左右提升到了 2.7 倍。新冠肺炎疫情没有改变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这种变化趋势，而是使其空前提速。根据 IMF 2020 年 10 月 13 日发布的预测，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1.9%，美国是 -4.3%，日本是 -5.3%，2021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 8.2%，美国是 3.1%，日本是 2.3%。如果按照这一预测值推算，2020 年中国的 GDP 将达到美国的 71.5%。这个数值大致与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路追赶美国时的最高点接近，大概在 1995 年前后，日本的 GDP 达到了美国 71% 左右的水平。到 2021 年，中国的 GDP 将相当于美国的 75%，将是日本的 3.12 倍。这意味着经历疫情冲击，中国经济由于“衰退更轻，回升更劲”，其与美国的 GDP 之比一举由疫情前的 2/3 攀升到了 3/4，增长了 9 个百分点。

第二，疫情加速了多边治理机制变革。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全球治理赤字已经非常严重，无论是联合国、WTO、IMF，还是其他多边治理机构，似乎都对它们应该担当的责任显得力不从心。疫情的暴发更显示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面对空前严重的疫情，其作为非常有限；面对金融剧烈震荡，IMF 没能发挥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作用；面对产业链条断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 也没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和效用。疫情在进一步凸显全球治理存在严重赤字的同时，也强化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需求。

第三，疫情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重构。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框架全面展开、快速推进、蓬勃发展，形成了三极格局：欧洲有欧盟，北美有美国主导的两个合作框架——北美自贸区（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东亚，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也启动了“10+3”合作机制。但在疫情暴发之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区域合作都遭遇反动，代表性事件是英国的“脱欧”和美国退出 TPP。与之相对，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本来是滞后的，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日本，进一步加大了推动区域合作的力度，一举在区域合作全球格局当中占得战略先机。就在疫情暴发前，参与 RCEP 谈判的 15 个国家已经达成一致，要尽快签署协议。新冠肺炎疫情对这一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也发挥了进一步强化、加速的作用。疫情暴发后，无论欧洲还是北美，其区域合作框架基本无所作为，其成员基本是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的欧洲，居然发生了在边境上抢口罩、呼吸机事件。反观东亚地区，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充分展现出各个框架下的区域合作，

无论是复工复产还是防疫抗疫,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尤其是 RCEP 的成功签署,更进一步加速了区域合作格局的重构态势,东亚区域合作后来居上的势头得到加强。

第四,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条重组。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条的重组已经开始,疫情只是进一步导致了产业链条的中断,从而使重组显得更加迫切进而提速。在产业链条重组方面,重点可能是要解决三个悖论。这些悖论有的是早就存在的,比如效率与公平的悖论。在疫情暴发前,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的动向,很大程度是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形成虽然提升了效率,但也加重了不公平,在全球产业链条重组过程中利益遭受损害的行为主体,可能是国家、非政府组织(NGO)、社会阶层或者政治团体,就会反对全球化,要求重组产业链条,这是一个悖论。第二个悖论是效率与安全的悖论。参与全球化,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毫无疑问会提升效率,但疫情暴露出安全成了问题,美国、德国这些制造业强国居然连口罩都生产不了,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第三个悖论是效率与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出现了“去中国化”的现象,要求强行与中国产业乃至中国经济“脱钩”;疫情暴发后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未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一定是在平衡好这三对关系,也就是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安全、效率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得到稳步推进。

第五,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中心已经显现出向东亚地区快速转移的势头,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势头。其主要背景和原因,显然是东亚各经济体在全球防疫抗疫和复工复产中有更加优异的表现。根据 IMF 的最新预测,2020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是 -1.7%,降幅比全球平均值 -4.4% 低了 2.7 个百分点;到 2021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亚洲的经济增长率将一举回升到 8%,比全球平均水平又要高出 2.8 个百分点。这种“衰退更轻,回升更劲”态势,意味着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东亚转移的进程。

第六,疫情加速了中国发展格局转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建议、定基调,提出要进一步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增量来看,中国早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中国发展模式因疫情恶化而加速转型,势必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之所以要转换发展模式,构建新发展格局,毫无疑问与疫情导致的安全环境问题有关,包括产

业安全、经济安全甚至是国民的生命安全，这些方面都使中国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时，必须更加重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疫情对世界经济及产业链的影响

姜跃春*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庸化”，但不排除少数国家经济恢复出现 V 字形反转的可能性，不过复苏的势头难以同步。首先，疫情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的脚步。目前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趋势没有减弱，相反，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第二次疫情高峰正在到来。这将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复工复产增加困难，不少国家开始考虑二次“封城”和“封国”，因此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尚需时日，未来一个时期或将延续“低利率、低投资、低增长、高债务、高风险”的基本格局。2020 年 11 月中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考察东京奥运场馆，并表示“非常有信心让观众坐在明年的奥运会赛场上”。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则表示，举办奥运会将是人类战胜病毒的标志。其次，走出衰退、实现复苏的关键在于找到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最佳平衡点。这次全球经济大衰退的最大特点，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自主性”停摆，因此控制疫情成为经济重启的重中之重。世界卫生组织多数机构认为，本次疫情可能会延续至 2025 年。在此情况下，各经济体如何实现控制疫情和复工复产的平衡，是能否走出危机的关键所在。再次，尽管未来的全球经济恢复可能呈现 L 形复苏趋势，但不排除某些国家出现 V 字形反转的可能。中国由于疫情防控卓有成效，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为数不多的靓丽风景。

第二，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难改，但其表现形式或将发生变化。过去几年里，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不断上升，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各国纷纷采取隔离防控、海关监管等疫情管控措施，短期内人员、要素流动必然受阻，这将导

* 姜跃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